



都市藏传佛教信仰状况管窥——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STUDIES ON THE SITUATIONS OF TIBETAN BUDDHIST BELIEF IN THE CITY : TAKING XI'AN CITY IN CHINA AS AN EXAMPLE

王海燕*

摘 要

近年来,内地大中城市虽缺少藏传佛教寺院载体和传统信仰积淀基础,但少数城市居民通过人际交往、寺院朝拜等渠道接触藏传佛教,皈依上师,从汉传佛教居士转变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信众主要依赖网络等新媒体进行组织宣传、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学习经典、持诵咒语和叩拜供佛等信仰活动。西安市藏传佛教信众主要为年龄在 35-55 岁之间的中青年知识精英群体,皈依上师主要为川、青寺院的高僧、堪布或住持。信众与上师之间虽然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但是严格依照上师讲法课程及修法内容念诵叩拜,通过网络教室集中研习佛经课程,希望通过上师的指引加持和个人修行获得圆满成功。

关键词: 藏传佛教 城市信众 信仰状况

ABSTRACT

There are very few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basis of traditional belief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of China. But in recent years, a few of urban citizens get in touch with Tibetan Buddhism b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visiting monasteries. Some lay Buddhists believing in Chinese Buddhism convert into devout Tibetan Buddhist followers. They propagate ideas,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share resources mainly by new media, including internet etc. Then they study classics, recite Buddhist mantras and worship Buddha. In Xi'an city, most of Tibetan Buddhist followers belong to intellectual elite group aging from 35-55 years old. Their masters owning high religious status mainly come from Sichuan province and Qinghai province. Although the masters can't speak fluent Chinese, their followers through translating still study Buddhist texts together by network classroom, recite and worship strictly according to masters' explanations. These pious followers eventually expect to achieve great perfection by blessing from masters and spiritual practices by themselves.

KeyWords: Tibetan Buddhism, Buddhist in City, Situations of Belief

*WANG HAIYAN 王海燕, (1974—), 女, 山东汶上人。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民族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 藏学

绪论

西安市是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城市中心及郊县存有多处历史悠久的汉传佛教寺院。随着佛教文化复苏和信众信仰需求的推动，汉传佛教寺院不断进行扩建与复修，信众人数逐渐增多。但是近 10 年来，部分汉传佛教信众转而皈依藏传佛教，并在皈依上师和弘法僧人的指导与影响下，成立组织松散、规模较小的信仰团体。西安市内虽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但由于信众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敏感性解读，信众自发成立的学修场所较为隐蔽，且主要在具有共同信仰的同事、同学和朋友等范围内进行沟通交流。目前，学界研究城市佛教发展主要以汉传佛教信仰为切入点（李向平，2007），或以城市藏传佛教寺院为研究对象（周泽如，2013），或以信仰规模化组织化的沿海都市为考察地点（刘晓梅，2006），或以随机调查临时前往寺院信众为研究对象考察地区信仰（王佳，2015）。本文拟以笔者深度访谈与切身观悟，尝试分析藏传佛教信仰较晚的内地城市信众信仰的状况，主要分析信仰选择的机缘、主要的信仰活动及宗教体验等内容，探讨西安市藏传佛教信仰个人性、非组织化特征，为研究认识当今藏传佛教都市信仰趋势提供参照与补充。

一、信仰机缘

（一）因于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信众逐渐转向信仰藏传佛教

1980 年代以来，西安市汉传佛教寺院开始重修扩建，信众与皈依弟子逐渐增多，相对固定的信仰群体频繁参与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和慈善活动。近年来，由于汉传寺院过于注重空间规模建设、佛教造像重塑，信众主要通过参与宗教仪式性活动获得群体归属感。目前寺院规划理念、管理模式、角色定位与延伸服务等逐渐趋于世俗化和商业化^{*}，缺失对僧教育的不懈完善及教制的齐整规范，系统研习和讲授经典渐趋边缘化，寺院仅在大型宗教节日期间组织集体诵经。随着寺院神圣性内涵的淡化或刻意人为的层裹与琢饰，以缺少系统佛学知识与行为示范性的僧众为主体的寺院渐失其佛教文化承载和经典诠释功能。寺院的僧众管理缺少严格的制度和戒律约束，僧众示范性角色逐渐减弱。寺院经济运作亦缺少严苛的监督制约规则和秩序且游离于社会经济范畴之外，鲜及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工作。汉传寺院所联系的部分信众（尤其是全家集体信仰佛教且长期参与寺院活动的虔诚群体）的精神诉求和宗教寄托难以实现，开始淡化疏离汉传佛教，主动剥离与汉传寺院及法师之间的联系。信众对世俗化汉传寺院造成僧众信仰期许偏差，寺院因于僧团教育和经典讲习的匮乏逐渐符号化，信众的宗教理解与佛理认知缺少僧众指导与评判，与之，对汉传佛教的宗教情感渐趋淡化，部分信众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原因之一。

^{*}汉传佛教寺院运作盈利方式从门票收入逐步转向寺院禅修、寮房租售和莲池海会等收益项目。

(二) 藏传佛教的文化张力吸引信众重新选择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属于同质宗教文化类型，两者的宗教象征与符号、宗教思想与行为等主体内涵基本相似。汉传佛教信众对藏传佛教的认知与理解较之其他宗教形式更易切入，信仰藏传佛教与此前的信仰并未切割，从接触、纳受到皈依的过程中亦未进行信仰意识和行为模式的彻底改变。信众选择藏传佛教是对曾经信仰活动与成佛路径的矫正和延续，他们透过宗教现象解读和对比汉藏佛教的概念与定位，感悟认知二者法脉传承、修行路径、上师神通、宗教仪式、造像仪轨等相关内容的差异。首先，信众从模糊的历史概念和藏传佛教各派别传统角度肯认藏传佛教的殊胜与权威。信众认为藏传佛教未曾经历汉地佛教历史的衰荣与法脉的断续，其传承是自释迦牟尼成佛以来绵延至今的神圣法脉。其次，信众认为藏传佛教修行方法更为具体细密，信仰活动从抽象的境界描述转变为具体的行动付出。譬如，十万次计数叩长头、供曼达、持诵心咒、供奉佛像等具体行动的累加与心智提升间存在着明确的计量转变关系。信众认为藏传佛教修行次第明晰，易循行量衡，依照上师所指导的路径点滴积累，可以超越过去的自己，往生迁识，最终解脱。最后，藏传佛教法师的示范性是信仰的实证支撑，认为法师是修持行为与成就获得的成功范例。由于语言隔阂与文化疏陌，信众将释迦牟尼佛的身份、品格及法力赋予法师，相信法师具有佛的资历与神通。法师的超越性与神圣性源于长期执着的修行与苦习，已经脱离凡人的弱点与劣势，他们可以作为信众个人修行的未来具象与持续修行的永动力。

(三) 启于藏传佛教基础理论，信于个人成佛资质

笔者调查的不定期参加信仰活动的 121 位虔诚信仰者，出生于 1960 至 1980 年代初之间，因于就业、创业等原因由陕西各县乡迁入西安市的第一代居民。大多拥有高等理工科或艺术学历背景，部分信众甚至为经济、科技、教育领域内的精英人士，属于西安市颇具影响力的中高收入社会阶层。但是，基于社会历史原因，绝大部分信众在未成年阶段处于传统文化断裂时期，甚至缺少基本的来自家庭的人文关怀和品格养成教育，曾经的专业学习与目前从事工作中较少涉及哲学伦理知识。藏传佛教法师授习的四摄六度、善恶因果、轮回业报等思想内容易于成为信众人生哲学的指导原则，作为回望和解释个人轮回迁变与世事流转不灭的注脚，甚至成为检视个人行为的规尺与平衡心智的衡器，藏传佛教高僧的行动诠释成为信众践行佛教理论的参照。因此，法师通俗化的理论阐发与谨严慎行成为信众尊奉藏传佛教的心理依赖因素。

虔诚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属于“内在取向的信仰者”（麦克·阿盖尔著，陈彪译，2005：33），他们不以宗教为手段妄求财位增益、福安庇护等世俗短利，亦不同于执求身心平衡的禅修，而是希望依怙上师成为补位的菩萨，在信仰过程中“产生归投、敬爱、崇拜所依怙对象的宗教感情”（陈兵，2001），如愿往生净土，最终解脱成佛。藏传佛教上师的怙主地位成



为实现信仰目的的推促因素，信众世俗生活的竞争经历形成信仰命运、承认因果的认识（凡勃伦著，蔡受百译，1964：203-204），成功的经验与处世的积累中养成规则的有效运用与利益的平衡能力。在现世修行能否成佛问题上，信众均给出肯定回答，一般会附加个人过往的成功阅历予以补充论证，认为信仰修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世俗行动之果因，笃信个人具备成佛的潜质和修行成功的基础。

二、信仰活动

（一）不分别教派的信仰

信众选择信仰藏传佛教，但不关注藏传佛教内部诸教派间的差异。在修行过程中，信众信仰与藏传佛教所联系的宗教象征，同时依据汉藏佛教的宗教节日组织放生、共修等集体活动，但是对藏传佛教哲学理论、节日文化和仪式象征等内涵较为陌生，认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法脉传承本源一致，各派法师的智慧和修行方式亦无差别。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信众先后皈依多名不同派别的上师，皈依者甚至不知道上师所属派别，他们一般是在朋友引荐下前往青海或四川的寺院完成皈依，其中不涉及派别的选择^{**}、对法师的观察判断等环节。信众认为藏传佛教的法师作为佛陀的慈悲化身，对其派别的区分、身份的考虑不仅远离信仰与修行的内涵，而且是对三宝不敬的心智障碍与精进阻滞。基于对信仰对象的敬畏与神化、对冒犯权威或可产生的惩戒及自我定位的卑微化是集体性信仰和群体关系巩固的原因。

不分教派的信仰有利于信众共享不同教派的讲经课程资源，联合举办法会、结聚共修，组织前往青海、四川寺院静修，成为促进西安市藏传佛教良性发展的有利因素。信众集体承认藏传佛教各派及法师阶层，并非因于“利美运动^{***}”的影响，而是基于对藏传佛教发展历程及信仰文化的陌生，从宏观的寺院建筑、语言系统、僧人阶层集体认知观照藏传佛教，宗教象征物与仪式亦整体性接纳，对相对陌生的藏传佛教集体性接纳凸显信众退出世俗化佛教的隐忍与无奈。

（二）短期传授与定期网络课堂研习经典

西安市目前尚未建立法师长期居住讲经的藏传佛教研习中心，少数僧人应邀短期前来西安市，在茶馆、会所或信众家中经由翻译传授经典思想内涵，主要讲述慈悲、安忍、利他、六道轮回思想、历史记载的神迹和现实超验故事等，回答信众日常修行及认知症结问题。少数信众参加寺院暑期家庭夏令营活动，一般为期 7-14 天。在寺院举办法会期间，附设短期

^{**} 克里斯蒂安·乔基姆认为“中国人进什么寺庙，请什么样的教职人员来主持仪礼，通常是根据具体的情势需要，而不管所进的寺庙、所请的教职人员是否属于自己所信奉的那个教派。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宗教重实践轻教义的倾向。”（[美]克里斯蒂安·乔基姆著，王平、张广保、沈培等译：《中国的宗教精神》，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 34 页。）

^{***} 笔者深度访谈的信众中无人知晓“利美运动”，且均此概念不感兴趣。

共修课程集中讲授经典内涵****。信众认为由法师直接传授的咒语和经文方可持诵修习，除此之外的经典阅读均缺少法脉直系的加持力，属于远离信仰的非神圣性行为。信众赋予法师卡里斯玛型的人格，将与之相联系的信仰活动及信仰者自身角色神圣化。信众在相对比较隐蔽的、仿照寺院壁画、造像装饰的共修场所，统一穿着喇嘛僧衣颜色的套装，临摹法师的动作和腔调念咒诵经，在构建的神圣空间中，以同质性行为与上师建立超时空的联系。

借助在线集中同步学习视频讲授课程是获益经典的主要途径。网络课程由寺院堪布开设，信众网络登记报名参加课程学习，寺院助理法师定期进行课堂考勤与考试*****，课堂严格按照登记年级进行分组管理，助理法师跟踪监督学员学习进度。信众在西安城区自发设立 20 多个网络课堂研习点，采取自愿报名选择课程，分时段、分阶段共习同修。课堂内容主要包括经典持诵、在线听授、问答和讨论等环节，信众实名互动参与问答讨论，阐述个人对佛教名相和经文内容的理解。网络课程主要为法师结合已经翻译成汉文的经典《观现庄严论》、《入行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阐发轮回真实不虚、因缘和合等理论，分析例证如何通达智慧脱离六道之苦的道理，结合世俗生活讲述以“善”为主题的行思。网络研习点是信众交流学习的平台，微信群是凝聚彼此和自我归属的虚拟空间，是西安市藏传佛教信仰群体的微基础。目前，部分研习点开始出现萎缩、合并甚至关闭的现象，笔者了解到部分信众从集中学习转向个人在线听闻，少数信众甚至离开经论研修转向布施、供养与叩拜等信仰形式。

(三) 定期共修与不定期的慈善活动

目前西安市仍未组建藏传佛教弘法团体，亦未设立信众共修或叩拜中心，仅有规模较小且因相对私密少数私人佛堂*****，信众组织稍大规模法会和讲经活动的次数较少。除网络课堂外，少数信众自发组织安排在私人佛堂叩拜礼佛，诵经修法。参与共修活动的信众关系比较密切，彼此分享与信仰有关的灵异故事、个人梦境与网络分享文本，讨论宗教体验和近期所参与的助念、结缘等宗教活动。信众在共修活动中逐渐增进信仰渴望心理，对佛事活动形成心理依赖并趋于日常化。由于西安市藏传佛教信仰尚处于网络追随的非自主发展阶段，信众尚未了解或接触藏传佛教法事活动或修法仪轨，加之定期共修活动中心较少，在青、川寺院举办法会或佛教节日期间，信众以个人名义供养善款或依照法师规定持诵咒语、食素放生。

信众在汉藏佛教宗教节日自发组织放生等慈善活动，活动所用资金皆由信众自愿捐赠，没有最低金额限制，从 10 至 2000 元不等。活动资金账目向所有参加者公开，结余部分由组织者暂时保管并移作下次活动资金。由于放生活动是资金开支较大的团体性宗教活动，每年组织的次数较少，参与人员相对比较固定，活动一般选择在周末进行，通过微信、QQ 朋友

**** 信众主要以短信或微信平台进行联络，参加藏传佛教寺院夏令营活动。

***** 助理法师为常驻藏传佛教寺院的汉族僧人或在藏传佛教寺院出家的汉族僧人，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笔试为在线填写打印后邮寄给助理法师。

***** 私人佛堂主要有两种，一是信众将住处一室、阳台或独立橱柜置设佛像、唐卡、供桌，供个人或家人叩拜；一是信众在单元套房设立佛堂，供信众前来共修、交流。



圈等方式发布活动信息，不对外发布邀约信息和募款广告。每次放生活动参加者一般为定期共修人数的 70% 左右，放生活动是西安市研习点的联合佛事活动^{*****}，信众认为慈悲和善待生命的活动是个人修行的递进，从而感受行动所积聚的成佛基础。作为具有公益性与利他性的慈善和环保行为，放生等活动的边际效益亦成为藏传佛教传播的有利因素。

三、宗教体验

信众以网络群组的方式组织佛事、慈善或朝拜活动，在组织约束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信众之间的暂时性联合系因于教典研习的规范性、修法共同目标的指向性及信仰活动资金账目的透明性。西安市的藏传佛教信仰活动是个体化的行动，没有社会性团体意识的介入，亦未委派专人负责检视或第三方监督。信众信仰活动中所感悟的宗教体验与宗教情感存有差异，宗教体验的自我融入诠释信众选择藏传佛教的合理性，神秘感印证出长期信仰活动的反馈与应验，欣慰感将信仰与生活相联系并逐渐成为生活意义的新载体，信仰依赖感成为个人与藏传佛教世界之间的交汇联结并定格出信仰者的价值。

自我融入源于集体性活动或个人参与宗教活动获得超越心理预期的受益发酵。信众在迭累繁复的信仰活动中表达着信仰目标诉求的神圣性，在个人与神圣空间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弱化世俗社会的规则与价值衡量，世俗生活的神圣化思维将宗教情绪融入个人、家庭及人际关系范围之中，并将佛教理念引入日常行为^{*****}、教育子女^{*****}与商业运作实践中。自我融入的程度差异与信仰时间的长短关系不大，主要与信众在信仰中的期待、对藏传佛教功用的理解以及对修行和现实对照关系的建立方式有关。

神秘感的获得是信众不断多方位联系诸多周围因素并自我解释的结果，这与法师的语言引导和神迹讲述，网络媒体对坐化舍利和前朝转世等神秘现象实存性宣传等有关。信众认为法师所讲述藏文经典中的转世授记、轮回不灭、因果报应等内容客观真实，笃信法师作为菩萨化身具有超越常人的神通，法师不受空间约束可以洞察信众行为与心识，具备“天眼通”并已达到不为外界所牵绊的“无我”状态。媒体复合历史和宗教等元素拍摄出诱导性宣传影像资料，宣说轮回和灵魂观念，信众将模拟性现场视为信仰功能和神力表象，神圣与世俗间的差异想象与比拟成为信仰的魅力向导。在偶然因素与信仰行为的联系中主动诠释神秘的价值，在顿悟教义片段前后的愉悦与满足，仿佛暂时性以自我与周围分离的状态旁观或重新审视难以言说却真实存在的直接感受。“信仰状态和神秘状态是可以互换的用语”（威廉·詹姆斯著，尚新建译，2008：307）在神秘感的支配下主动联系现实和周围事物，俘获类似神迹踪影的画面、声音甚至幻觉，“在感受到人外的力量之后，人通常设法与此力量取得协调。取得协调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宗教活动”（蒲慕州，1995：20）。并且可以从因果关系解释佛事活动的合理性与神圣性。

***** 少数信众偶尔参加汉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定期放生活动，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 信众长期坚持佛教饮食禁忌与素餐，主动将此与佛教的慈悲与轮回思想联系在一起。

***** 部分信众引导年幼子女念经、拜佛或参加共修。

欣慰感并非信众信仰活动的附属品，而是将法师所讲的“利他”与“性空”理论运用于实际行动的心理效应。从利益他人的角度出发，信众主动参与寺院救助、藏区慈善活动，前往藏传佛教的寺院和藏区学校或孤儿院布施捐赠。信众在与寺院相联结的慈善活动中感受着自身行为的神圣与惠馈，并将此作为直接与佛陀建立联系的凭借渠道。信众间彼此信任和开放性交流体验与世俗空间的交往迥然不同，修行过程是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相互补充与完善，信众主动将世俗生活交付于宗教信仰的规则与秩序，期许通过个人行动远离现实社会的悲观情愫，重建理性有序的社会关系模式。

依赖感表现为对法师和佛事活动的双重依赖。法师和佛事活动是修行圆满的引导者与路径通途。法师是以自身行动践行佛陀教旨且现世获得成就的典范，而有法师导引的佛事活动的净化和矫正是防范个人意识散逸的关键，亦是与佛菩萨进行沟通的有效途径。信众对于藏传佛教法师出家、学经与修行的经历比较陌生，并尝试以神话的方式自我解释法师的行为与神通，将成佛所具备的资质、能力和境界赋予法师，他们对于法师的依赖涵括着对修行成功者的膜拜以及对个人行动前途及目标履现的寄托。宗教依赖情感是信众将世间和出世间加以连接的纽带，也是维系信众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内在因子。

结论

西安市藏传佛教信众主要为川青藏地寺院法师的皈依弟子，信仰活动亦未依赖于复苏重建比较晚近的广仁寺。因于藏传佛教内地发展的政策空间相对小，广仁寺尚未开设面向信众的佛教佛学课程，目前主要采取类似汉传佛教寺院的运作模式，在重大宗教节日组织开放性祈福供奉活动。大部分藏传佛教信众虽前往广仁寺礼佛叩拜，但与寺院僧众之间并未有师承关系，注重宗教仪式和宗教参与的寺院对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影响比较小。西安信众人数总体规模较小，未设立固定城市信仰组织或信仰中心；信众与寺院间仅为暂时性、仪式性的概念归属关系；信众注重个人在家视听闻法、叩拜诵咒，仅逢佛教节日自发组织放生或布施；信众普遍参与网络课堂经典的同步学习，重视藏传佛教咒语持诵与仪轨修持；信众极度崇拜藏传佛教僧尼及与之相联系的佛教象征物，不加分别的接纳观念形成对僧尼的心理依赖及自我矮化意识，这一信仰心理也成为藏传佛教僧尼与内地城市信众间依附性关系存在且不断强化的关键因素。

信仰活动的分散性和信仰意识的自主性是当今城市藏传佛教信仰状况的特点。西安市的藏传佛教信仰是非组织化、个体化自主信仰的典型，信众希望依据个体意愿选择修行方式，直接受益于法师讲授并遵照佛教教义规范个人行为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内地城市化特征。由于汉藏语言差异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目前尚未有来自藏地的法师长期驻锡西安市区定期授课、组织法会。信众依靠视频课程、流通法本和网络交流平台与法师相应，信仰活动中核心人物的缺位是西安市信仰分散性的原因之一；信众对信仰生活的个人化需求是抑制组织建立、分散自修的另一因素，信众认为任何形式的组织团体均是修行的间接性壁隔与障碍，组织团



体的严密规则与法师的超越性地位限制信众与法师的直接交往以及佛事活动内容的自主性。

“一个人的自己的信仰只有在它是个人性的时候，才会是活生生的、深刻的和真实的。”信众在信仰中将“自我”与佛陀诠释为现世与未来、羁绊与超脱的关系，认为彼此间存有通达路径与不间断的时空联系，自觉将行为与意识融入信仰世界，对于“自我”未来的肯定定位成为行思的主动约束。信众不强调信仰活动的社会公益性与教化功能，而是将个人慈悲意识的培养与如法修行精进作为解脱究竟的可赖资粮。

参考文献

- 王佳. 当代东北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状况调查研究[J]. 世界宗教文化, 2015 (1)
- 刘晓梅. 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对仁真活佛在广东的田野调查为例[D]. 中国: 四川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李向平. 信仰与社会变迁[M]. 中国: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 陈兵. 佛教宗教信仰心理观: 三种宗教心理. 法音[M]. 2001 (5)
- 【英】 麦克·阿盖尔著, 陈彪译. 宗教心理学导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周泽如. 大都市中的藏传佛教寺院研究[D]. 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美】 凡勃伦著, 蔡受百译. 有闲阶级论[M]. 中国: 商务印书馆, 1964
- 【美】 威廉·詹姆斯著, 尚新建译. 宗教经验种种[M]. 中国: 华夏出版社, 2008
- 蒲慕州. 追寻一己之幸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 中国: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